



牡丹在春风里嫣然

刘江滨



一年四季皆有花开,而春天最为繁密,所谓“春暖花开”是也。楼下的杏花、桃花、梨花次第绽放,煊煊赫赫,妖妖娆娆。这些花开在树上,气势先就占了上风,人来人往,都仰着脸看。灌木丛中主要有两株牡丹,却等别的花谢了,兀然盛开。紫色的花朵大如手掌,姹紫可说是“恹紫”了,行人路过莫不诧异,咦? 这里咋还有恁好看的牡丹! 于是,脚步缓下,眼神蜜蜂似的在花朵上盘桓。与树花相较,牡丹开在低处,却以大、奇、艳胜。人会扬长避短,花也是。人们仰视树上的花,俯视灌木的花,俯视的同时却也哈下了腰。

多年前我去洛阳旅游,正遇上牡丹花开时节,顺便就去了牡丹园游览。不过,那时对花漫不经心,一个男人流连花从总觉有些矫情,因而,走马观花,匆匆一瞥,留下的印象犹如海滩上的沙塔,被岁月之水冲刷得稀里哗啦。近闻邢台柏乡的汉牡丹已到花期,心念一动,遂和妻子驱车前往。进入园中,只见春色满园,花团锦簇,竟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欸”的一下,洛阳牡丹的景象在脑海里复活,两景叠印一处,时光无缝对接。

春天的绿是新绿,水灵灵的娇嫩,洋溢着勃勃的生命气息。绿树环绕着畦畦牡丹,仿佛一个个穿军衣的哨兵。朵朵牡丹花在青枝绿叶中怒放,在春风里妩媚嫣然,用“姹紫嫣红”形容远不够,还有白的、黄的、绿的、粉的等,真可谓五彩缤纷,绚烂之极。据说,汉牡丹园有九大色系,光红色就有火炼金丹、红霞映日、藏枝红、满江红、卷叶红、曹州红等多种。牡丹花朵硕大丰腴,花瓣层层叠叠稠密,色彩绮丽烂漫,仪态万方,雍容华贵。这天并非双休日,却游人如潮,往来不绝,除了观赏拍照,还有不少人在做直播。

柏乡牡丹不如洛阳、菏泽名气大,但“汉牡丹”的标识凸显了它的与众不同。这里有个来历:相传王莽新朝末年,天下大乱,义军蜂起。刘秀在河北被王郎追杀,四处奔逃。一日来到北郝村弥陀寺,只见残垣断壁,竟无处藏身,此时数株牡丹开得正好,与周遭荒芜颓败格格不入,兀自娇艳。刘秀情急之下钻入花丛,牡丹枝叶舒展将其掩盖得密密实实。刘秀逃过一劫,感念牡丹救命之恩,题诗曰:“小王避乱过荒庄,并庙俱无甚凄凉。惟有牡丹



花数株,忠心不改向君王。”由此“汉牡丹”得名。对此,民国版《柏乡县志》谓:“此说虽不可深信,然足证其年代久远,况至今犹盛乎? 每年谷雨节前后,其花盛开约千余朵,枝粗如椽,花大如盘,颜色不同,有红有白,形状各异,有单有双,浓香四散,数里外犹觉香气袭人。”

汉牡丹园新建了一个小院,将七株汉牡丹和五墩芍药用木栏围起来,并加了顶盖。其中有两株牡丹花开正盛,丰满的花朵密密匝匝,几乎将绿叶覆盖,而那些芍药尚在沉睡,含苞待放。传说牡丹和芍药为一对仙女仙子所幻,故相依相伴,次第开花。有学者研究核检,此处牡丹单朵花复瓣竟达125瓣,委实令人惊叹。而且汉牡丹同株异花,异地不活。据说,当年侵华日军曾企图将其移栽日本,百般侍弄,但均告失败,无不枯亡,人们因此称赞牡丹宁死不屈,有民族气节,在大家心中更是被罩上了神灵的光环。汉牡丹所在之处,曾经是一小学院内,但没有一个孩子攀折损毁,大家视之为神花,都怀有敬畏之心。

牡丹之名,大医李时珍这样解释:虽结籽而根上生苗,可无性繁殖,故谓“牡”,其花红故谓“丹”。最初它的名字却叫“鹿韭”“鼠姑”,是不是挺难听的? 它原生于深山幽谷间,鲜为人知,以药名载于《神农本草经》,因与芍药相似,故又称为木芍药,俗呼牡丹,老百姓常视作荆棘刨回家当柴火。南朝宋时,谢灵运在文集中言永嘉一带水际竹间多牡丹,北齐的杨子华画牡丹也极佳,牡丹开始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牡丹从山野之花摇身一变为国色天香、花中之王,据说是因幸遇了贵人武则天。某日,武则天回山西老家省亲,游览一家寺庙,在众香精舍外的草地上,发现有花奇异,芳香扑鼻,惊问上苑怎么没有这花啊? 遂命令移栽至皇家园林。也难怪,唐人段成式说他翻阅隋代《种殖法》七十卷,花药中都没有牡丹的名字。还有一个故事也与武则天有关:武则天冬月游后花园,见百花凋零,一派肃杀,心中烦闷,下旨次日百花都必须开喽。次日她再游后花园,果然,百花盛开,争奇斗艳,却唯有牡丹不肯违逆时令曲意逢迎,武则天大怒,遂贬牡丹于洛阳。然牡丹并非但没有因此湮灭不彰,反而因不畏权贵、劲骨刚心愈加声名大盛。这故事自然属于民间演绎,不过,花与人一样,貌美只是皮相,须得有内在的气质和风骨才算真

日影西斜时,一家小店里的非遗手工制作还在继续,你看,那几个游客正在店主的指导下制作手工漆扇,一把扇子在手里轻轻转动,流光溢彩的刹那,仿佛在演绎一场水上芭蕾,旋转、跳跃,最终定格在绚烂的色彩之中,手工漆扇的制作过程便成了一段美妙的艺术体验。一张大桌子周围围坐了一群孩子,他们在店主的带领下有在制作手工穿串,有的在制作具有年画形象的手工香皂,还有的在拓印勾描杨柳青年画。“90后”店主说:“手工制作如同打开一扇多维成长之门,孩子们在完成作品时收获的成就感,不仅让他们有了自信心,而且培养了他们的专注力和对美的感知。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的心得到了传统文化的滋润和丰富。”

暮色初临时分,一个小铺暖黄的灯光次第亮起。这家小店经营非遗香囊、古风特色茶器、木制小摆件、具有杨柳青年画特色的水晶制品、十二生肖小饰品、古瓷片磨制的小项链等文创产品。来自东北的店主小李正在给一群外国游客一边介绍一边演示,一个法国游客正在试戴银质发簪,小李灵巧地为她挽了个惊鸿髻,铜镜中映出一个古典美人,意大利摄影师的快门声响起一片。此时店内的多种语言交谈声,恰似大运河的流水,裹挟着东方美学的吉光片羽,静静地流淌向世界的许多角落,当法国姑娘买走最后一支竹节玉簪,门楣上的铜铃轻响,仿佛千年前丝绸之

路的驼铃穿越时空而来。华灯初上,剪纸技艺的第八代非遗传承人张老师正在店里进行现场直播,百年剪纸技艺被解构成几何图谱,花鸟鱼虫、吉祥娃娃的图案化作极简线条,跃动在红纸上,被做成有特色的伴手礼。柜台后一位老人家一脸慈祥,笑着说:“老匠人教我们把剪刀当刻刀用。”此刻她手中的红纸正在“生长”出机械齿轮的轮廓,传统与未来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夜幕降临,古镇里的康养民宿更显魔幻——雕花窗棂透出柔和的灯光,投影在院中的水景墙上,竟是一幅动态的“莲年有余”年画,锦鲤在光影中游动。老板笑称这是“非遗数字化”,来自北京的一个设计师感叹:“住在这里,仿佛睡在历史的书画里,却又能触摸到当下的温度。”这样的民宿体验,正是杨柳青古镇文旅融合的生动画卷。

当运河上的游船亮起灯笼时,我站在石拱桥上回望。垂柳掩映的街巷里,青砖院落与玻璃幕墙相互映照,老茶馆的评书声与咖啡馆的黑胶唱片乐声在暮色里交织。那些被年轻人重新编织的文化基因,正沿着古镇的经纬线生长蔓延。忽然想起一家小店墙上写的一句话:“所谓永恒,不过是无数个此刻的层叠。”杨柳青的时光皱纹里,有着最新鲜的晨光。运河的水面倒映着璀璨的灯光,宛如一条流动的星河。

这座被时光反复浆洗的古镇,就像一棵千年古树,老根深扎泥土,新枝已触云端。当年轻的血脉在时光的褶皱里奔涌——古老的基因与现代灵感的和鸣,正谱写着永不谢幕的传统乐章。

题图摄影:李志进

正的美。

到了唐玄宗时期,牡丹之盛臻于顶峰。据《松窗杂录》载,一日,唐玄宗在花园赏牡丹,问侍臣,谁的牡丹诗写得最好? 侍臣回答,是李正封,有佳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玄宗笑着对身边的妃子说,你去梳妆台前喝一杯紫金盏酒,和李正封的诗就对应上了。由此牡丹就有了“国色天香”的美誉。《松窗杂录》又载,一日,宫中沉香亭前牡丹开得正妍,唐玄宗携杨贵妃月夜游赏,下诏特选来一众最棒的梨园弟子听命,歌手李龟年手捧檀板,准备随乐一展歌喉。唐玄宗说,赏名花,对妃子,焉能用旧乐旧词呢? 遂宣旨召来翰林李白,李白的酒劲儿还没全醒,《清平调》三首援笔立就,有名句迭出:“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沉香亭前的牡丹果然非同一般,一枝上开两朵花,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内,香艳各异。

唐玄宗缔造了“开元盛世”,牡丹的雍容华贵与盛唐的富庶繁荣有一种内在的契合,加之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牡丹走红势成必然。诗人骚客吟咏牡丹的作品也就如雨后天春笋遍地冒尖了,王维、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皆有诗作,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刘禹锡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地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人对牡丹的喜爱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白居易《买花》诗中云:“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一丛深色的牡丹花,价钱大约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税赋。所以有老农偶至花市,只能望花摇头兴叹了。《独异志》载,唐宰相裴度酷爱牡丹,晚年因病退隐,在永乐里休养,暮春之日抱病游南园,牡丹却未开,他深感遗憾,叹息道,我不见花而死,可悲啊,怅然而返。次日一早,有人报告,园中有一丛牡丹花开了,裴度赶来赏花,三日后薨逝。真可谓牡丹花下死,死而无憾了。

至今,牡丹依然是人们的心头好。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说,洛阳的花种类甚多,其他花皆称某某花,只单以“花”称牡丹,且凡花园没有不种牡丹的。许多文人喜欢牡丹,如苏轼、范成大、陆游等,尤以欧阳修为甚。欧阳修作《洛阳牡丹记》,被称为我国最早的牡丹专著,记述了牡丹的花品、种类、风俗及栽培技术等。从中可知宋代牡丹的两大极品——姚黄魏紫,被称作花王花后。春天里,洛阳城的人无论贫富贵贱天上大都会插牡丹花,连街上挑担的士子亦如此。苏轼也曾头插牡丹,熙宁五年(1072),他在杭州吉祥寺赏牡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其实这年苏轼还不到四十岁,并不老,他是自嘲且有些难为情了。

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即便牡丹享有花王之尊,也不可能独霸天下。我在一本书中看到,有人统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出现的花木次数,梅高居第一,而牡丹只列第七。中国文化史也可谓一部花史,不同的文人各有所好,如屈原佩兰、陶潜采菊、崔护喜桃、周敦颐爱莲、林逋梅妻、郑夔嗜竹等,使文苑变成了五彩斑斓的花园,并每每赋予其独特的精神内涵。不光是文人,普通人谁不爱花,尤其是不少女人,见了花走不动道,一脸痴迷状。其实,人们赏花从来不单纯是因为花美——色彩绚丽、姿态妖娆和气味芳香,而是潜意识中将对其对象化、人格化了,在观赏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心理与情感,花是人,人是花,二而一了。

从汉牡丹园出来,时值正午,仍有车辆与人流儿鱼贯而入。我不禁想起那个独爱莲的周敦颐所说的“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果真如此啊。大众喜爱牡丹,是因“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其艳冠群芳的雍容气度、浓烈馥郁的富贵气象,正暗合了太平盛世民众普遍性的精神寄寓。

满庭芳

第五三五一期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在村东头土崖下挖出一块拳头大的红胶泥。泥块在掌心搓揉半日,捏成了个歪歪扭扭的形,我在底端戳出三个小孔,对着孔洞鼓起腮帮子一吹,竟发出闷雷般的嗡嗡。这声音惊得树杈上的麻雀扑棱棱飞,也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原来泥土会唱歌。

后来在镇中学,音乐老师举着一只陶埙说,这是先秦乐器。褐色埙体布满细密的孔洞,像被虫蛀过老树根。我攥着省下的早餐钱,买下了人生第一件乐器。每天清晨蹲在操场杨树树下练习,从“呜呜”的破音到能吹出《苏武牧羊》的苍凉曲调,指腹被孔沿磨出薄茧。

直到花甲之年,我仍未见过比陶埙更朴素的乐器。今年春天,陕北高原的槐花开得正盛,空气中浮动着甜丝丝的香气。我站在延安宝塔山下,看着黄河水裹挟着泥沙奔涌而过。谁能想到,就在这片黄土层深处,考古队挖出了中国音乐史上的惊世发现。

延安博物馆新展厅里,七支陶埙静卧在恒温恒湿柜中。它们来自新石器时代遗址,经测年数据确认,年代集中于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3000年,属庙底沟文化晚期。同类器物在客家庄二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中均有发现,显示出黄河中游地区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最年长的那支陶埙通体泛红,埙体残留暗红色纹饰。经拉曼光谱检测,纹饰含朱砂成分,推测其中可能掺有动物胶质。我凑近玻璃罩,看见埙腹内侧有道半指宽的凹痕——这是先民拇指长年按压留下的痕迹。

“这些埙出土时就摆在墓主胸口。”讲解员指向投影幕布,复原场景里,老者平躺木棺,双手交叠捧着陶埙,身旁散落着石磬、骨哨。监控镜头记录下开棺瞬间:当考古铲轻轻拨开腐朽的织物,埙体表面钙质结晶在光照下呈现丰富的色彩,令考古人员啧啧称奇。后来仪器检测显示,埙体内壁附着层肉眼难辨的钙化物,正是这种特殊结构让沉睡几千年的音符得以苏醒。制作陶埙要先筛选含铁量高的红胶土,经反复揉制后置



沾上丛话

袁静,这位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其人生轨迹和文学创作与天津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她不仅在天津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还在这里留下了她文学创作的最初印记。

袁静,原名袁行庄、袁行规,1914年出生于北京,1930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她在组织安排下前往天津宝成纱厂开展地下工作,这段传奇的革命经历为袁静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素材,她以此为背景写下《宝成纱厂的女工生活》一文,发表在党刊《北方红旗》上。1935年,袁静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武汉青年救亡协会宣传团团长、“全国剧协”二战区分会理事等职。1945年,袁静赴延安文协创作组工作,写下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她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将革命话语融入作品内核,通过戏剧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成功实现了革命思想的民间化传播。1949年,袁静与孔厥合作创作的《新儿女英雄传》更是引起巨大反响,小说用民间形式塑造“集体的英雄”,并对民间英雄叙事进行修正与超越,为后续“新英雄传奇”创作提供了有益参照。

1957年,袁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工作,曾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1958年冬季,天津市委宣传部召集各区局的宣传干部开会,组织编写《天津工厂史丛书》,会议指出,天津具备编写工厂史的优越条件,有众多历史悠久、革命斗争历史资料丰富的工厂,以及一批工人作者和通讯员可作为编写力量。随后,市作协具体规划了《天津工厂史丛书》的编写计划,提出了数十个选题,涵盖了天津市多个知名大厂及大型购物中心如劝业场等。袁静协助编写了丛书中的一部《大地回春》,小说以天津东亚毛麻厂为叙事空间,构建起工人、国民党特务与资本家三元对立的斗争图景。小说将工厂车间转化为革命“战场”,机器设备成为罢工斗争的武器,财务报表包藏资本家盗窃国家资产的祸心,作品将阶级斗争嵌入工业生产流程的叙事策略,既延续了其上世纪30年代《宝成纱厂的女工生活》的创作母题,又通过章回体特有的悬念结构,强化了革命叙事的戏剧张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救助流浪儿童成为社会工作的重点之一。上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建立了以收容救助、教育矫治为核心的流浪儿童帮扶体系。流浪儿童收容教育问题引起了袁静的重视,她深入集中收容安置流浪儿童的汉沽农场进行实地采访,搜集到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创作了中篇小说《小黑马的故事》,这部作品不仅是她儿童文学创作的处女作,也是她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破土之芽,荣获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小说以流浪儿“小黑马”的改造历程为叙事主轴,构建了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寓言。故事结尾,为了农场的机器不被大火烧毁,“小黑马”不顾一切地扑向起火的汽油桶,导致自己多处烧伤。这一英勇行为不仅展现了他对集体的忠诚与责任感,也象征着他从流浪儿童到社会主义新人的彻底转变。从消极对抗到主动参与,从自我放逐到价值重构,作家通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个体在制度关怀下破茧成蝶的成长轨迹。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袁静将全部精力投入儿童文学的创作当中,创作了《芳芳和汤姆》《众英雄和小捣蛋》《李大虎和小刺猬》《叮叮和当当》等作品,深受广大小读者的喜爱。其中,《芳芳和汤姆》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教育意义的佳作,小说的创作背景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紧密相关,以中国小学生芳芳和美国小学生汤姆两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少年儿童为主角,以二人的相识为起点,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情节发展,如学习上的互助、生活中的摩擦与和解等,逐步推进故事的发展,展现了中外儿童跨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融合,以及他们之间建立的纯真友谊,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也促进了读者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天津,这座与袁静有着深厚渊源的城市,不仅见证着她的革命历程,更滋养着她的文学创作。从宝成纱厂女工罢工风波到《新儿女英雄传》的集体英雄赞歌,从汉沽农场流浪儿童改造到改革开放后的跨国文化碰撞,袁静始终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将社会变革融入文学创作当中,用几十载笔耕不辍的实践,在红色经典与儿童文学两个领域间架起桥梁,使革命话语通过工厂机器的轰鸣与农场少年的蜕变,真正实现了“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的文学使命,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于阴凉处缓慢脱水。坯体成型采用泥条盘筑法,之后借助木制模具塑形。开孔最见功夫,要先用烧石片钻出小孔,再插进鸟骨磨制的扩孔器,边旋转边用鹿角锤轻叩。我盯着屏幕上旋转的陶坯,恍惚间似看见窑火映红的脸庞,听见骨锥与陶土摩擦的沙声。

展厅尽头响起空灵乐声。一位年轻的演奏家捧着复刻的陶埙,在吹奏据考古资料谱写的《原始狩猎曲》。7个音孔次第张开,低沉的埙音化作鹿鸣虎啸,时而如猎犬追袭的急促,时而似篝火旁的喘息。我的手指不自觉地跟着节奏颤动,仿佛触摸到先民围猎时狂跳的脉搏。

隔壁展柜陈列着制作陶埙的工具:磨制光滑的鹿角棒、边缘卷刃的烧石片,还有串在皮绳上的骨制扩孔器。这些粗糙器具与现代陶艺工具并置,展现着跨越几千年的技术传承。最令我震撼的是一只儿童尺寸的陶埙,出土自一个12岁少年的墓葬,埙体刻着歪斜的太阳纹——原来我们的祖先,和现在的孩子一样,也会在音乐中寻找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离开博物馆时,夕阳正为宝塔山“镀金”。街边传来卖枣老人的吹奏声,他脚边竹筐里躺着几十个粗陶埙,每个都裹着层湿润包浆。我蹲下身,指腹抚过埙孔边缘的凹痕,突然明白了这些螺旋纹路里藏着什么:是先民制作时掌心的温度,是祭祀时颤抖的指腹,是孩童练习时沁出的汗水,是几千年来无数双手传递的密码。

当晚住进窑洞宾馆,我翻出压箱底的旧陶埙。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埙身上,那些陈年污渍突然变得清晰可辨——是黄河故道的风沙,是黄土高原的尘埃,是时光沉淀的印记。我对着窑洞拱顶吹响第一个音符,浑厚音波在砖窑穹顶下回旋,竟与白天听到的古埙旋律悄然重叠。此刻方知,真正的音乐从不曾消亡。它化作黄土高原的沟壑,变成延河的波浪,封存在陶土的纹络里,等待某个偶然的契机,在某个人的唇底重新苏醒。就像此刻,我的呼吸与几千年前某位制埙人的气息共振,黄土深处飞出的歌谣,始终在华夏大地的胸腔里隆隆作响。

袁静：革命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双重书写

王谦



津派文学与文化从谈(三)